



追寻红色足迹 重温伟大历史

■ 袁秉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红色足迹”遍及各个革命老区。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满满的正能量。

从一大会址到南湖红船;守初心、担使命、去奋斗。

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家园。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路。

当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由于遭到巡捕袭扰,代表们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继续开会,完成了大会最后的议程。小小红船承载千钧,开启了跨世纪的航程。

新时代,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从江西都到苏区首府;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和传播。

来到原中央苏区赣南于都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当年革命十分艰难,但人们心中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就一定会前赴后继。新时代,“这个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要,要把这个火烧得旺旺的”。

以大别山为中心建立的鄂豫皖苏区,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先后爆发 100 多次工农武装起义,逐步创建了以新集(即新县)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五师在这里开辟抗日战场,创建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1946年6月,中原部队从这里实施中原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1947年,刘邓大军在陈粟、陈谢大军的配合下,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转折。

正是因为有信念如山、初心不改的革命精神,大别山的革命火种得到了保存。新时代,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建军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甘肃高台到北京香山;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1937年1月,西征中的红五军将士在甘肃高台同数倍敌军血战九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兵殇高台,包括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内的近 3000 人壮烈牺牲。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作出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观看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党中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辉历史的主题展览,等等。

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越开放越自信

■ 黄力之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这个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顺应世界历史规律,中国打开国门,取得了巨大成功。以接受外来投资而论,1978年至21世纪之初,中国获得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是日本1945年至2000年外来直接投资累计总和的10倍。通过利用这些资金,中国成长为世界最大的产业基地、最大的消费市场,甚至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国。

中国通过适应世界大变局,改变了自已,也改变了世界格局。研究显示,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指数从0.4逐步增长到1.2。

继续打开国门,是构建“四个自信”的需要,也是“四个自信”重要体现。通过打开国门,让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亲眼看到中国的真实情况,看到改革发展的成就,看到中国的繁荣富强,看到中国的和谐稳定。唯此,那些诋毁、歪曲、攻击中国的舆论才能真正被击破。

同时,在打开国门的支撑下,那些走出去的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服务,会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表,以不同的方式向世界诉说中国的实际状况。其中,大量的中国旅游者在世界各地出现,既反映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的提升,又反映中国社会制度对人民自由权利的充分赋予。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继续打开国门,中国就能继续在历史前进的洪流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发展。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探索科技治理新型举国体制

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 陈强

当前,科技创新迎来发展的历史机遇期。进一步优化国家创新体系、系统提升科技新治理效能,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

更具韧性、黏度、张力、活力和弹性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创新体系的比拼。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总体科技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创新指数排名持续上升,基础研究“多点突破”,学科实力不断增强,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等创新指标表现抢眼,科技人才储备已形成一定规模。

特别是,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超级计算等战略领域实现跨越发展,人工智能、5G、物联网、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领域占据发展先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高科技领域的新锐力量。

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向纵深发展,国家创新体系也暴露一些局限性,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and 压力。

例如,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现象仍较突出,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产业化、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不足。

又如,科研院所改革、建立健全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创新型人才培养等领域的进展滞后于总体进展,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激发出来。

显然,面对新的全球变局,科技创新亟待提升治理效能,形成更具韧性、黏度、张力、活力和弹性的体系能力,推动实现从点到面、从局部到系统的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 李建伟

日前,上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举行会议,强调“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准确理解把握和着力落实这一部署,是一个重大课题和重要工作。

秉持法律准绳 用好法治方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怎样把握两大任务的关系,需要更高的理论站位。

第一,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建设的理论统一与实践统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两次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全面依法治国重大任务,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发展,具有鲜明的理论统一与实践统一特点。

第二,法治是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本质上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有利于提高社会活动的规范性和可预期性,能够有效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将法治确立为国家治理基本方略,有利于把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系统纳入法治轨道,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调节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规范社会行为,通过法治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提供治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法治是现代国家应对日益复杂治理形势的基本方式。大量各种社会主体多元利益的分化与冲突,通过纳入法治规则之中,有助于实现国家系统稳定与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等一系列法治措施推进各方面事业发展,已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与显著优势之一。

第三,法治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方面,通过法治可以实

网络化、数字化、平台化及社会化

当前,我国在诸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例如,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我国在数据和商业应用方面已形成一定优势,但与领先国家相比,在基础算法领域的差距仍然很大。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心态变得日益复杂,戒备心理急剧抬升,各种质疑和指责层出不穷,国际科技合作的外部环境遭遇严峻挑战。

可以预见,如果不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持续突破,将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甚至危及国家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科技新治理必须承担起保障高质量科技供给的责任。

国家创新体系一方面需要承担不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责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的科技财政投入减少的困难局面。这就更加需要创新主体的密切协同,推动科技与经济的融合、科技与教育的融合,缩短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技术原型到产品开发和商业化的时间。

事实上,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迭代加速,科技创新模式和科研组织形式正显现网络化、数字化、平台化及社会化趋势,“开源、外包、社文化、并行式”成为创新体系的新特征,群体式、策略化、有组织的颠覆性创新日益重要。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态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开始从实体、组织之间的竞争,逐步演化为系统、生态之间的竞争。这都对科技创新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避免出现“越位”“错位”

提升科技新治理效能,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科技创新治理中,政府要贯彻和落实国家战略意志和重大要求,集中资源和力量,构建战略科技力量,不断推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攻坚克难。

一方面,要提高政策和制度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为科技创新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要正确发挥学术团体、行政决策、市场机制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要厘清各类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及协同关系,避免主体“越位”“错位”与“错位”。同时,增进创新主体间的互动,推动创新网络和创新生态的形成,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

二是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国际上,先进技术、关键技术越来越难以获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因此,在涉及国计民生和长远发展的核心技术领域,不管存在多大差距,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积极探索和推进科技创新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力求自主可控。

同时,推进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质量。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开展国际科技合作,集聚和运筹全球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的有效性和效率。当然,这种开放必须建立在新的对等能力和平等对话的基础上。

三是处理好科技创新中“源”与“策”的关系。

科技创新治理是“源”与“策”双螺旋交互推进的过程。“源”强调的是科技创新条件的形成和累积;“策”指的是依托“源”的条件,策划、组织和实施各类创新活动,不断推动科学新发现,促进技术新发明,催生产业发展新动能。

经验表明,高水平的“策”可以进一步提升“源”的质量和能级,为更高层次的“策”创造条件。通过“源”与“策”的高效互动,有助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依法治市

现政党政行为、政府行政行为、企业经营行为、社会活动行为、公众社会行为等的规范运行。另一方面,通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机制、法治方法有助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解决问题冲突,保障社会有序稳定、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发展进步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社会各个领域大量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的制定颁布、推进实施与成效显现,以及整个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贯彻落实和具体工作层面就是要围绕党和国家事业新时代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决策部署,按照科学化和现代化目标,既改革不适应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不断提升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从而使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基础支撑。

党的十九大强调,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持依法治国,就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必须要有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建设必须要有法治保护,百姓平安福祉必须要有法治守护。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政治到法治,从政策到法律,把党的主张更好转化为国家意志,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工作。

围绕“三个服务”做到“三个聚焦”

更高站位,要求有更高的政治站位。在领导干部的所有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新时代,上海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要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中深入贯彻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着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

更高站位,要求有更高的大局站位。上海在国家改革发展和现代化治理大局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要“挑最重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上海必须服务国家战略和全国大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现代化、法治化为目标,勇挑重担、再接再厉。

更高站位,要求有更高的工作站位。上海要以更高的工作目标、更高的工作水平来谋划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工作目标应该更高——不局限于法治建设本身,而应围绕“三

个服务”,服务改革发展更有质量,城市治理更有水平,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覆盖改革发展稳定、城市治理服务、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全面工作。工作水平应该更高——不小富即安、小成即可,而应紧密结合国家战略任务和上海重点工作,做到“三个聚焦”:聚焦重大任务、重点工作扎实推进,聚焦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聚焦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更大力度,要求更大力度提高立法质量。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支撑。在全面依法治市中,要不断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机关主导、市民参与立法的方式,如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等;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在立法中的作用;进一步拓宽市民参与立法途径,完善立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听证会、公众征询等程序,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充分反映人民意志。同时,还有必要发挥法治工作者特别是专家智库优势,推动上海立法质量不断提高。

更大力度,要求更大力度提高执法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可结合“推动法治上海建设”的要求,使法治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标志”的要求,围绕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完善,聚焦难点、痛点、堵点,深化“放管服”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政务公开法治化发展完善。同时,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透明、规范、合法、公正,不断健全执法制度,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提高智慧执法水平,加强执法监督,落实职责责任制。

更大力度,要求更大力度提高司法效果。在依法治市相关司法工作中,应坚持司法为民,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按照中央部署,针对当前社会问题和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完善司法改革相关配套制度,推动司法质量、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全面提升,努力实现更公正、更高效、更专业、更权威的司法,努力让市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将上海打造成为中国法治环境最好地区之一提供司法保障。

更大力度,要求更大力度提高守法层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的建设目标。“三者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法治体系的重要完善,法治工作的重点工作。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中,要进一步落实市民的主体责任,激发、维护 and 保障广大市民的主人翁作用,增强人民群众崇尚、遵守和捍卫法治的积极性、主动性,使法治成为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上海智慧,提供中国样板。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特聘研究员)

■ 郑荣造

对于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来说,需要重点提升全球文化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如资本、人才、平台、技术、生产机制等。特别是,要聚焦特色文化资源的要素转化,注重对优势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使彰显上海特色的丰厚文化资源能够实现优质文化产品的转化。

上海在城市建设目标中提出,要建成令人向往的人文之城。“令人向往”的基础之一,就是大力提升上海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影响力,要让优质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生产与输出。

现实中,能够产生广泛文化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无不具有强劲的文化生产能力及文化产品的输出能力。对标其他几个全球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巴黎,上海在文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文化资源的开发方面既有优势又有短板。

在文化资源的核心内容方面,上海具有独特的优势——江南文化、红色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汇聚,为文化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基础。在文化设施和文化载体方面,无论是标志性的文化设施还是基础性的公共文化设施,上海都不弱于其他几个全球城市,比较欠缺的是重大文化设施的世界影响力还比较弱,尚无法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等相提并论,在文化设施的运营能力、利用率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

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方面,“上海出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已有不小的进步,但也有不足。比如,现代影视制作工业体系尚未形成,虽有一些优秀之作,但缺乏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还如,虽然在演出的数量方面,上海在亚洲处于领先水平,但原创优质演艺产品的生产能力还比较弱,没有出现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之类的演艺集聚区。

从文化资本的投入方面,多为政府培育扶持资金,民营资本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各类文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不是很好。在政策供给方面,单一领域的政策供给较多,统筹协调不够,符合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法治保障还不够完善,版权保护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尚有欠缺。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推进建设优质文化产品全球创制中心。

一是深化文化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围绕和聚焦促进文化资源要素充分流动,着力消除制约文化创新创造力迸发的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引导不同文化需求的市场表达机制,平衡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二是发现、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广泛吸收融合古今中外的各种优秀文化资源。重点是在把握产业融合和文化发展新业态机遇基础上,研究和开发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生产要素的新途径与新模式。特别是,要运用市场手段,探索上海文化发展在长三角区域文化整合、中华文化当代融合、世界文化交流融通上的现代表达。

三是用好用足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把上海打造成为世界文化创新高地、文化创新思潮的引领者、现代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的输出者,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中占据显著的地位。

四是把握信息技术和相关新业态的发展趋势,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的融合发展。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做强做优一批集新技术和全媒体功能于一身、在全球范围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传媒集团,在展示上海文化形象、输出上海文化产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搭建世界级传播平台。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公共文化研究室主任。本文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与解放日报合办的“尚社新声”沙龙活动研讨发言)

■ 赵红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从传统的“二要素”“三要素”“四要素”跃升为“六要素”“七要素”,有何深层次的意蕴?

一部经济学的演进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生产要素和财富增长携手并进的历史。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有关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增长因素的核算以及经济增长模型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欧美经济学家发现,随着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在生产中重要性的递减,知识和技术进步日益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第五要素”“第六要素”。相应地,伴随知识、技术的大幅度提升,整个世界的财富增长逐渐走向知识、技术和创新要贡献的新发展阶段。

站在这一生产要素演进发展的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之外的第七大生产要素——数据,肯定也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并成为生产力和财富再一次增长的契机。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将带来生产过程的精准生产以及生产、运输、销售的无缝链接。这将大大降低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同时,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之间的匹配度将大大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得到提升。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还将创造大量新的生产性服务业、非生产性服务业。这就意味着服务业分工会增加,服务业内容将更趋专业化。同时,大量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活动也将由于数据的融入,而大大提高管理效能。

站在这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加强对数据的保护、存储、使用、交易等方面的安全规范,是值得每一位经济学家认真思考的课题。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

打造全球文化创制中心

从「三要素」到「七要素」